道光年间的崇阳抗粮暴动

罗丽达

大约自十九世纪初期，清王朝开始步入危机重重的年代。官僚机构冗员充斥，行政效率日益降低。人口的过分膨胀已经超出了当时农业生产力所能维持的水平。鸦片贸易的逆差使清朝的财政严重短缺，经济面临崩溃。清代政府对漕粮的经营——历来是国家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也腐败不堪。各级机构人员冗杂，漕粮每次易手或每过一关，都要被盘剥搜刮一次，使漕粮浮收问题越来越大。而地方官员则把这种财政负担转嫁给粮户，造成每户实际交纳的米谷比原定额往往高出数倍。这种粮税的剥削造成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的此起彼伏的抗粮运动。这些运动大部分集中在长江下游漕米负担最重的地区。这些抗粮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们大都由地方下层士绅所领导。因此它不仅是中国十八至十九世纪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激化的表现，而且，它也使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的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地方下级士绅——生监阶层的社会作用的升级。以钟人杰为首的崇阳县的抗粮暴动就是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一次。

1.崇阳县的抗粮运动及其领导者

崇阳位于湖北南部山区。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这里本不是发达的产粮区。道光二十一年春，湖北省发生涝灾，崇阳县“霪雨，夏麦（早）熟。”① 初夏，又发生虫灾：“六月，苗多螟”。② 秋季，湖北发大水，三十余万人流落江汉。③ 这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造成的贫困与官吏变本加厉的盘剥相形日彰，成为暴乱极有效的促发因素。

湖北省的漕粮舞弊由来已久。武昌府告示宣称：“湖北漕务积弊，民苦浮勒，官无经制。其取于民者厚，其交于公者微。类皆中饱于丁船杂费及上下衙门一切陋规”。④ 而粮户最直接的克剥者似乎是那些官僚机构最下层的秘书当差，所谓书吏，胥役们。魏源在“湖北崇阳县知县师长治墓志铭”中就提到：“崇阳…胥役故虎而冠，凡下乡催征钱粮漕米，久鱼肉其民”。⑤

这一时期的史料在一定程度上亦证明政府上下级官吏都在不同层次上卷入这种勒索行为。黄钧宰在《金壶七墨》中曾提到湖广总督周天爵，说：“皖人周某官于楚，无是利，谋加漕价，至十千外。”⑥ 魏源的墓志铭又透露，崇阳县令折锦元实为敲诈勒索的下级胥役的后台。他说：“前知县折锦元愦不治事，一惟胥役所为，致两次哄漕”。

有上司的支持，下层胥役则有恃无恐。军机大臣穆彰阿的会审奏折中称：“该县每逢开征，各户书私自向各花户需索耗银样米，时相吵闹，由来已久”。⑦ 为了缓和粮户的愤怒，湖北巡抚伍长华规定，漕粮每石不得加征超过一斗。并将规定刻在扁额上，悬挂在县衙门，拆毁了胥役们的差房。但是问题远没有解决。就是在这个时候，钟人杰的名字出现在官方档案之中。

钟人杰是什么人物？他的简历如下：

钟人杰（1804—1842），崇阳县桥墩堡人。道光七年科考，取进县学文生。道光十六年

(1836)因包庇程中和挖煤控案，代作呈词，犯案斥革生员头衔。发配孝感县三年。道光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钟人杰到达孝感。七月七日，因在配穷苦逃回。

很明显，钟人杰以及他的同伙陈宝铭、汪敦族、金太和都属于生员、监生阶层。由于人口增长，各地参加科考，获取低级功名——生监身份的人数也大量增加，因为官僚机构的容纳量有限，大多数生员监生没有向上升迁、获得官阶的可能性。许多人居于乡里。这一阶层的人物受过教育，在地方社会往往是有威望，有影响的势力集团，这个集团的力量随着他们主持地方公益事务范围的扩大而逐渐增长。作为政府和下层人民的纽带桥梁，他们在地方行政上往往起着积极作用，政府时而利用这些人的影响力控制下层社会；另方面，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范围往往与官僚的权力范围相重叠，因此，时而发生冲突。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官府与地方士绅在地方行政上携手合作的机会并不多，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二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官方文献中对这些地方士绅的指责常常是“包揽钱粮”或“包揽词讼”。

这里有两条臧否不一的史料。魏源在他的“师君墓志铭”中这样记载：“生员钟人杰，金太和者亦虎而冠。与其党陈宝铭、汪敦族起而包揽输纳，不数年皆骤富。与县胥分党角立”。而黄钧宰《金壶七墨》中这样写道：“崇阳诸生钟人杰富而好善，百姓感之，遂奉人杰为首抗粮不完”。⑧ 不难看出，所谓包揽不过是为生监集团所掌握的政府与粮户交易中的一个中间环节。他们一方面靠包揽为自己谋求利益，另方面，又为粮户们的利益与官府力争。地方生监往往上下左右于官与民之间。既为民所求，又为官所用。儒家传统教育要他们报效国家，而实际利益又迫使他们与官抗衡。他们可以作为民意代表与官府说项，为民请命，又可能作为官方的，受权人负责地方事务及教化。它是官府与百姓相交接的前沿地带，又起着缓解官民冲突的缓冲作用。但这种平衡只在一定限度内有效。一旦平衡失去，生监阶层或是被推向平民百姓一边成为群众暴动的领袖，或是与政府携手成为镇压暴动的力量。如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团练即属后者。而钟人杰领导的崇阳暴动则属于前一类型。⑨

2.生监集团与胥吏的诉讼官司

崇阳抗粮暴动的直接起因应该说是生监士绅集团与官府最下层的胥役书吏之间的冲突。

道光十九年(1839)，知县折锦元在任。陈宝铭、汪敦族、金太和及蔡德彰与钟人杰商议，准备呈状控告崇阳县历时已久的漕粮舞弊。钟人杰既为逃犯，不便亲自出面，于是鼓动陈宝铭等人呈控于当时的湖广总督周天爵。此案转递省衙门审理，审明后，与此案有关连的胥吏都受到革职处分。生监的诉讼暂告胜利。

道光二十(1840)年，一年一度的漕粮征收又开始了。崇阳县生员蔡绍勋唆使被革书吏重新把持漕征，继续舞弊。由于初战告捷，钟人杰等人委托金太和进省再度呈控。此时周天爵因为滥用刑罚被革除总督职位。⑩ 裕泰继任。也许生员们意识到只惩罚个别书吏不起作用，于是请求省级官吏变更漕粮规例。这种“过分”要求很可能触怒了官僚们。金太和被拘下狱，给生员们的诉讼热情泼了冷水。

绅士集团的受挫使衙门胥吏欢欣鼓舞。道光二十一(1841)年一月二十一日，王士奇、金良义两位被革书吏蓄谋报复，在蔡德章的婚宴上诬告他拐劫新娘，准备告官追究法办。但蔡德章纠集堡内民众拆毁了王士奇的房子。蔡绍勋借此机会给王士奇写了状子，鼓动他上省告状。蔡德章因此系狱。同时知县折锦元由于疏忽职守被革职。金云门代理知县事。九月，师长治到任，成为新任知县。

形势对生监集团越来越不利。钟人杰听说“上游缉捕甚急”，⑪ 他们必须四处躲避以防被

捕。与此同时，金太和之子及叔父请求钟人杰帮忙营救金太和出狱。钟人杰预感到如果金太和官司打败，胥吏们将会变本加厉，他和他的同伙们将会遭殃。既然官司是由蔡绍勋怂恿王七奇上告而引起的，何不拘押蔡绍勋为人质，而胁迫官员们停止究办呢？

十二月十日，金青茂与同伙一道聚众突袭蔡绍勋住宅，钟人杰在家等候。当陈宝铭、金青茂赶到蔡家，蔡绍勋早已闻信逃入县城。金青茂点火烧了蔡宅，继而赶往县城。他们一到县城，城门已闭。于是在城外聚众呐喊。第二天清晨，新任知县师长治闻讯，下令紧闭城门，但金青茂及同伙们拒不解散。守城兵丁用弓箭石头自卫。十二日凌晨，金青茂等众人从城墙缺口处冲进县城。在城中找不到蔡绍勋。最后，他们强迫师长治向省城发函请求释放金太和回籍，被师长治拒绝，声称要将他们系狱法办。汪溃仔大怒，将师长治当场打死。当时武昌知府明竣正在蒲圻办理事务，离崇阳不远。师长治事先曾嘱托他的长子师世杰悄悄出城，世杰带官印于十四日到达蒲圻，请求明竣就近弹压，然而明竣急忙跑回武昌。

钟人杰在民众冲入县城不久也赶到了，他意识到祸已经闯大了，不如干脆揭竿而起。他下令众人不许散伙，并把汪敦族招来，“商同据城抗拒”。⑫ 于是，一场下层士绅集团反对个别胥吏的诉讼官司发展成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暴动。

3.崇阳暴动

占领崇阳县城以后，起义的民众开始从事各项准备。首先，钟人杰被众人拥为元帅，陈宝铭、汪敦族为副元帅，金青茂等十一人为头目，在城外摆列木桌作为帅台，制造令旗，帅印及三军司令等旗号。⑬ 他们杀了蔡绍勋全家及其勒索粮户的已革书吏丁炳等数十人。其次，陈宝铭等人被派往崇阳四十八堡征集兵丁，每堡出兵千人。“从者佩红巾，不从者死。”⑭ 很快组织了上万人的武装。洪下僧人白青自愿参加，“称有法术可避枪炮”，⑮ 钟人杰利用他的巫术鼓动民众。第三，开碾仓谷打造器械，释放囚犯，强迫富人捐献钱粮。起义兵丁每人每天配米二升，钱二十文。又在乡间收取铜铁器皿销毁，打造枪炮刀械，并配制火药。把紧要路口掘断，各头目将兵丁分带各处，设卡据守。⑯

道光二十二年（1842）当崇阳起义爆发，正值鸦片战争的紧张时刻。浙江镇海、定海失陷、大部分湖北官兵已被调往浙江防守，武昌城仅留有一千兵丁守护。朝廷闻报崇阳乱事大惊，急忙调原来计划派往天津防卫英军的陕甘兵丁前往湖北，同时急敕崇阳临近各县及省“饬属一体查拿防堵，以免窜越”。⑰ 暴动部队利用湖北防御空虚的机会四面出击，攻击周围县城，力量迅速壮大。“金鼓声达数十里，势张甚”。⑱

崇阳暴动经历了几个大的战役。

（1）占领通城

通城在湖北南部，陆水上游，邻接湖南江西等省，与崇阳相邻。对崇阳大本营的保卫具有特殊意义。钟人杰的口号是：“破通城，有钱粮；破通山、有硝磺，破蒲圻，有战场，破咸宁，下武昌、到了武昌做国王”。⑲ 暴动的官兵都停止照清朝的习俗剃发。很明显，暴动的目标是湖北省府，目的是建立一个反清的政权。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义军首领谭九海率三千人攻打通城。通城知县李垒稍作抵抗即“怀印奔逃”。⑳ 义军顺利占领了通城。于是“开仓散谷，要结人心”。又“著谭六向四乡富民借钱”。㉑ 钟人杰任命汪敦族为通城知县，但扶泷为千总，派兵驻守。据城一月左右，每日操演。同时派人四处探听消息。㉒

十二月二十七、二十九日，谭九海、饶肉他三率领暴动军队攻打港口、官塘二驿。夺走

马匹上百。但他们攻打裕泰戒备森严的丁泗桥而不去攻打防守薄弱的蒲圻是一个战略错误。丁泗桥是南北交通要冲，离湖广总督裕泰驻兵的咸宁不远。三十日为除夕，趁官军度假疏于防备之机，暴民二千人与裕泰军战于桥边。清军副将双福率援军及时赶到，义军撤退。

通城位于三省交界，政府的控制相对薄弱。如果暴动组织得力，在攻势上避强就弱，也不难取胜。然而暴动仓卒成阵，缺乏纪律，人心不齐使他们在以后的几次战役中遭受一次又一次失败。同时，清廷也意识到崇阳、通城的地理位置，急令湖南巡抚吴其浚驻扎岳州防守，又令江西巡抚吴文溶负责义宁的防守。此时湖北提督刘允孝率军急速开赴咸宁，与裕泰同时“筹划”。从此，义军遭到官军有部署的进攻。

（2）通山战役

通山位于富水上游，幕府山北，是个山城。明末李自成最后战败，死于这里的九宫山。道光二十二年元月初一，义军千人在金恢先,雷一青、僧白青带领下攻打通山。义军刚到，清参将清保下令开炮，义军死数十人。通山知县顾羹梅率领地方绅士练勇助战。清将双福已有准备，“连环枪炮四面施放，直前攻击”。㉓杀死七十人。战斗持续了一天。义军抵挡不住，翌日撤离。一月三日，另一队人马包围了通城北严家山节水峪，“闻城中有备，引去”㉔。

元月十日，数千义军再攻通山。分成两队，一队越过西山突袭，自山坡向通山城开火。清保率清兵迎击，官军在火力掩护下仰攻西山，攻下义军阵地。义军溃退。

（3）蒲圻战役

蒲圻战役是起义首领竭尽全力，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义军损失最大，决定其最终失败的战役。

元月八日夜，义军首领集中所有武器，大约一万人分两路向蒲圻进攻。一路抄近路，另一路乘船顺陆水而下。九日凌晨，陈宝铭，金青茂、刘老五及僧白青等率领义军齐集蒲圻城外，占领了东南山坡，向城内猛攻。官军由郭雄飞及刘定煊率领，枪炮齐发，义军掩蔽于城墙角落，轮番出击。㉕

元月十日，义军再次发动进攻，四面包围了城市。蒲圻眼看攻下。清将双福率领援军从咸宁赶到，趁义军用餐之际，直冲义军营垒，城内官军也趁势冲出助战，开炮轰击，北门外死伤两千余人。义军首领金青茂，刘老五也被炮弹炸死。义军阵脚大乱，四处奔逃，枪炮抛弃满山。被官兵所获。船只也被官兵烧毁。

义军似乎决意要拿下蒲圻。十一日，义军又从南面攻城。清军副将裕贵登城防卫被炮弹击中面部。为了防止敌人迂回进攻，汪敦族驻守通城，派但扶泷攻击湖南平江县敌营，但两路都失利。㉖

十六日，钟人杰任陈宝铭为元帅再攻蒲圻，由洪下水陆并发，竟相占据山坡形势之地。此时，刘允孝的官军已开进丁泗桥。刘允孝派双福、刘定煊由东西两面夹攻义军。义军死伤上千人。

蒲圻战役对义军是个致命打击。也是战争形势的转折。蒲圻战后，官军即转而采取攻势，义军只能被动地防守了。

4.政府的镇压和起义的失败

蒲圻大捷之后，官军开始布署进剿。他们采取分进合击的方式，于元月十八日，西路由湖北提督刘允孝率领由丁泗桥进攻桂家岭，进取西岭，义军“阻塞路口，在岭拒敌”。㉗官

军枪炮齐发，击堕崖下者十余名，余皆惊窜”。㉘由于屡遭失败，义军士气不振，精神萎靡。以致临战一触即溃。刘允孝很快占领包牛、薄刀等岭，继而以地方士绅为向导暗探由石盘山进攻崇阳。

北路军由游击谢正国率领，于十九日进攻小岭。同日，东路参将清保由通山进夺泉口、界头等卡。当日大雨，义军形势极为不利，官军缩紧了对崇阳的包围。

二十日，东路军于黑桥与义军交火，杀伤四百人。又缘梯凿磴，击破崇阳附近的白霓桥。㉙钟人杰已将汪敦族由通城召回，令但扶泷暂理通城事宜。钟人杰意识到大势已去，与陈宝铭、汪敦族，以便衣逃出崇阳，被当地绅士诱至官军，崇阳陷落。

通城人听说钟人杰被俘，一些亲清的地方绅士即将但扶泷等捆绑，于元月二十二日系送清军，于当地处死。同日，官军进入通城。钟人杰领导的抗粮暴动至此以失败告终。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根据朝廷谕旨，钟人杰、陈宝铭、汪敦族被解送京师凌迟处死。

崇阳暴动始于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占领崇阳，终于道光二十二年元月二十二日通城陷落，共持续四十天。义军组织了两万余人，占领两座城市，震撼三省地区。清朝为镇压起义召集了五千军队，花费军费二十万两，但是崇阳暴动所揭示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崇阳乱事甫定，又发生了湖南耒阳抗粮事变。耒阳诸生杨大鹏“亦以漕价太重，集众数千人作乱”。㉚崇阳暴动不久，太平天国又爆发于广东。震撼全国。这些暴动起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生监一层的地方士绅扮演的积极角色。纵观十九至二十世纪地方社会的演变，可以看到地方士绅社会作用与参与范围的扩大。政府与官僚机构对这种社会参与开始指责、禁止，继而默认，以至最后正式认可。对地方士绅这一阶层的观察与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近代基层社会的变迁。这种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现代政治。

---

①②《崇阳县志》卷十二，杂纪，灾祥。

③《湖北通志》灾异。

④⑤魏源：“湖北崇阳县知县师君墓志铭”，载《古微堂外集》卷四，第33—36页。

⑥⑧黄钧宰《金壶七墨》卷四，漕变，这里肯有一个谎误，周天爵任职湖北之前曾官于安徽，周原籍山东，非安徽也。再，没有旁证材料证实黄的论断，因此这里的记载不一定准确，但它提供了一点官场内部情况。周天爵于道光十九年六月至二十年十一月任湖广总督，见《清代职官年表》。

⑦⑫⑬第一历史档案馆，上谕档方本，转引自孔飞力、费正清合编《钟人杰起义档案集—清代档案介绍》第11号档案。

⑨关于地方士绅的讨论，参见孔飞力：《晚清起义及其敌人—1796—1864年社会结构的军事化》(Philip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197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

⑩见《续碑传集》卷二十五，第3页。周天爵的革职很可能大大影响了省级官僚对生员集团的态度。

⑪魏源“师君墓志铭”见(5)

⑭⑮⑱㉕《湖北通志》卷七十，武备志八，兵事四。

⑯钟人杰口述，见孔飞力等编《钟人杰起义档案集》第9号档案。

⑰同上书，第1号档案。

⑲汪敦族口述，见孔飞力等编《钟人杰起义档案集》第9号档案。

⑳《清实录》道光朝，卷365，第18页b。

㉑㉒《清实录》道光朝，卷366，第8页a。

（下转第50页）

总之，康熙二十年顾炎武曲沃之行，目的是寻找新的落脚点。这并非清朝中央或地方政府逼迫所致，很可能是顾炎武在当地士绅排挤下被迫做出的新选择。

①《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以下均简称《顾集》）页162.

②从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详参《鲒埼亭集》），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到今人赵俪生教授都忽略了顾氏家难及其对北游的影响。王遽常《顾亭林诗集汇注》、赵俪生师近著《顾亭林与王山史》首次提到顾氏家难，但缺乏进一步探讨。

③④《归庄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232、319—320.

⑤⑥⑳同①页201.204.81.

⑦⑫王遽常《顾亭林诗集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页1317.1294

⑧⑨⑩⑪同③页339.323.557.

⑬⑮⑯⑰⑱⑲同①页193.313.305.56.294.

⑭详参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万历四十年癸丑条.

㉑李因笃《续刻受祺堂文集》.

㉒转引自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康熙二十年九月条。

㉓㉔㉖㉗㉘同①页210.168.87.214.426.

㉕李因笃《旧年宁人先生以无妄系济南，走书报我，触暑驰视，苦疾作，辞还，先生寄赠三十韵诗。春日晤保州，重会蓟门，奉答前诗广五十韵》，转引自邓之诚《清纪事初编》卷八"李因笃"条.

㉙赵俪生《顾亭林与王山史》（济南，齐鲁书社，1986）页65—66.

㉚㉜㉞㉟同①页206.422.79.199.

㉛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康熙十九年十月条.

㉝详参《顾集》页87、208，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康熙十七年条.

㊱㊲㊳㊴㊵同①页192.81.215.214.

㊶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康熙十八、十九年条.

㊷㊸㊹㊺㊻㊼㊽同①页87、216、213、214、210、192、94.

（上接第32页）

㉓《清宣宗实录》，卷365，第31页a.

㉔《通山县志》卷三，政务志，兵事.

㉖《清宣宗实录》卷366，第13页.

㉗㉘《清宣宗实录》卷366，第20页a.

㉙《湖北通志》卷七十，武备志八，兵事四.

㉚黄钧宰《金壶七墨》卷四，漕变.